

中美欧三边关系结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

唐永胜

内容提要: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世界变局深度发展,全球权势扩散趋势加速演进,一个伴生性结果就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形成三边复杂的利益交汇。随着全球性、跨国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全球治理,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体系,这尤其离不开中美欧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不断进化。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未来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针对美国将中国排挤出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企图,须保持思想和战略上的冷静,要以更大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深化与欧盟和其他主要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基本稳定并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做出积极调整,争取欧盟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促使中美欧三边关系真正实现向典型的三角关系转换,保障国际关系民主化取得重大进展。

关键词:中美欧三边关系 跨大西洋关系 世界变局 权势扩散 中国战略选择

在当前及未来可预见的全球政治演变进程中,中国、美国、欧盟构成最为关键的三支力量。到目前阶段,中美欧三边之间虽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互动,但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仍是欧洲安全的支柱,也成为美国的“霸权之翼”,并且是长期主导欧洲局势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制度基础。尤其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特朗普政府伤及盟友的“美国优先”政策,向欧洲不断示好,意图拉拢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对此,有人担心原本就不等边的中美欧关系会进一步失衡,并严重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然而从更长时段来看,随着世界变局深度演进,世界范围内的权势扩散很可能进一步加速,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迁,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更为突出。美国、欧盟和中国作为全球政治三个主要权力中心的

地位逐渐明朗和凸显,相互之间也将产生更多的互动。在日益复杂多元的世界,国际秩序总要不断地变革发展,对全球治理的诉求也会不断强化。世界需要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框架,这离不开中美欧作用的发挥,也必然带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不断进化。

一 权势扩散使中美欧三边关系重要性逐渐凸显

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前景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从本质上看,世界局势的演变具有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根源,不论欧盟还是中国的未来发展都离不开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即使仍在极力维护其霸权的美国也要受到这种条件的刚性约束,需要在世界变局的演进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理解中美欧三边关系,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个闭合的力量组合体系,否则无外乎会得出地缘制衡或三国演义式的结论。时代条件已经改变,大国关系的性质也已呈现许多新的特点,中美欧三边关系应该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下来认识,这样才能理清其未来发展的脉络。

人们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界定当今世界变化的深刻性,也就是说,当前的世界变局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之变和性质之变。实际上,沃勒斯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意识到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已经走向终结,并对新世纪世界体系的深刻变迁做出了分析和展望。^①21世纪20年代正在见证,资本主义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过载状态,资本扩张逻辑发展到了极限,传统军事手段也难以保证政治、经济效益的转化,现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已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稳定与持续繁荣提供有效保障。“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自身在演化和转型,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影响要素参与到国际进程之中,多种要素错综交织共同发挥作用”,^②这就使得局势演变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期,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系统效应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世界变局中,虽然主权原则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也仍然是国际体系运行的最主要形式,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国际组织、地区合作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非法的跨国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权势扩散已经不可避免。正如秦亚青所言:“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表现出来。”^③由此带来的权力转移或权力流散也日渐显著。约瑟夫·奈强调世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② 唐永胜:《解析世界变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第1-7页。

^③ 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界正在发生两种关键的权力结构变化:一种是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权力转移;另一种是信息革命发展导致的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致使全球政治复杂性不断增加。^①实际上,斯特兰奇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即已证实权力流散的广泛存在,也就是传统的国家权威正在向非国家权威流散,政治权力不可阻挡地向市场转移,甚至市场权威的实际载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的权威已经超越国家权威。^②

现实中,权势扩散的速度超出想象,并且构成世界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世界变局涉及所有国家和各个层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和欧洲所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直到目前仍在持续并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西方实力相对衰落已成为事实,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也在相对下降。这不仅体现在21世纪以来美国及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比重的相对下滑,^③更体现于美国霸权工具的滥用带来的反向制约明显增加,自身的霸权信誉受到损害。经济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债务国;即使在军事领域,美国可以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却很难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收益,这一点在中东和阿富汗体现得最为明显。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美欧经济社会动荡,许多深层次问题延续至今。危机并非始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属于周期性的经济调整,实质上是因为美欧经济模式陷入深刻危机,这是国际体系进入过载状态的经济基础,也是世界变局重要的经济根源。世界经济始终面临重大风险,美欧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在此背景下,美国不仅不能为欧洲提供足够的同盟红利,就连自身的困境也难以摆脱。

权力流散带来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差异的扩大,具体反映到中美欧关系上,则表现为不尽相同的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与美欧之间尽管存在利益冲突,但也形成了复杂的利益交汇,其中中欧利益重合的比重要更高一些;另一种是美欧之间尽管有北约纽带的维系,但在利益需求上存在的差异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欧洲国家依赖跨大西洋关系获得过巨大利益,目前也在付出日益增加的成本,北约东扩及其职能转型使这一军事组织的政治色彩趋于浓厚,而欧洲自身的独立防务又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其面临的诸多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却得不到缓解。对于欧洲而言,依靠

^① [美]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②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数据可以计算得出,1985年七国集团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65.1%,之后较长时间这一数据虽有起伏但基本维持,2000年仍为65%,但到2010年降到49.8%,2019年则进一步下降到45.2%。<https://www.imf.org/en/Home>。

跨大西洋关系已不能解决自己重要的关切问题,甚至还会被束缚住手脚。德国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工程中遭遇美国严重阻碍,并不是个别案例,只是美国的真正意图已无法掩饰。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遇到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如果继续深入参与北约,就不可避免地被看作“大西洋团结的霸权主义统治下驯服的配角”。^①也就是说,参与一种同盟或某一安全机制所能获取的收益与付出成本的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当“获得的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时,这部分的利益的重要性可能下降,而机制不能提供甚至可能阻碍的那部分利益则可能更显重要。”^②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美欧国家尤其是美国,其内部的经济结构出现了财富加剧集中的明显趋势,造成经济和社会分化的力量如此之强,还看不清何时才是尽头。托马斯·皮凯蒂甚至认为,不仅在美欧,或许这可能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不平等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催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③皮凯蒂找到了分化的根本力量在于 $r > g$,其中 r 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 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在逻辑上就可得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④这一研究无疑摧毁了美国也包括欧洲一些保守势力的信条,即人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就可以成功的社会,富人的财富都是赚来的。现实是富人的大部分财富并非来自辛勤的工作,而是源于已经拥有的资产。分配严重不平等就会引发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而根据皮凯蒂的预测,整个21世纪, r/g 这一比值很可能处于一个逐渐升高的趋势,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国家到2030年可能达到500%左右。^⑤

美欧国家的国内问题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变局的不确定性,但无论结果如何,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都比过去要凸显。美欧实力仍然雄厚,美国的霸权在较长时期内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不可能像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比较迅速地崩溃。^⑥然而美欧都有自身的严重问题,而且至少在较长时间内可能自顾不暇。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欧洲能够从冷战和冷战结束初期分享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如何适应世界的变化并有效捍卫自身利益,已成为欧洲政治家们不得不重点考虑的问题。“美国优先”原则出台后,欧洲已

① [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4页。

② 唐永胜、徐奔郁:《寻求复杂的平衡——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⑤ 同上书,第198-200页。

⑥ 如曾经预见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就系统阐释了美帝国将在2020年崩溃的前景和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参见Johan Galtung,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And Then What?* 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不能指望从美国那儿获得多少好处,如果仍和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甚至可能严重损害欧洲的利益。也就是说,欧洲不仅会被束缚住手脚,在地缘政治中左右为难,而且可能“因内部压力和矛盾加大而走向崩溃”。^① 面对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安全挑战,欧盟迫切需要拥有自己独立有效的防务力量以及更为协调的政策。在世界变局中,美国和欧盟的利益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许多重合,无法像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共同应对所谓的“来自中国的挑战”。如今,美国对欧洲的主导优势虽然总体上得以维持,但无疑正在逐步削弱,至少无法体现为全方位和全领域,跨大西洋关系的连接纽带日渐松弛的倾向难以得到根本性逆转。

利益差异增多,目标也就必然趋向分散。美国拜登政府为修复受到较大伤害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做出许多新尝试,但受其国内政治生态影响,要想彻底扭转并不容易,甚至在较长时间里,“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②仍将持续。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拜登面临国内政治张力的挤压,外交政策选择空间严重受限。欧盟独立防务是形势发展所需,近年来法德协调增加,是对美国打压法德、拉拢中东欧的回应,也是两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捍卫欧洲一体化做出的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之所以提出要建立一个“主权的、联合的、民主的欧洲”,也是基于上述原因。^③ 更进一步,“如果法国和德国不能为欧洲解决问题,那么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代替它们为欧洲解决问题”。^④ 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也印证了这一点:峰会取得的实际成果有限,更多的具有象征意义,欧洲国家的关切很难落到实处。

毫无疑问,欧洲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那样紧紧追随美国。面对拜登“美国回来了”和对华共同施压的呼唤,欧洲与美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调和配合已经有所恢复并出现提速迹象,在对待欧洲安全上也有共同的担忧,但欧美之间各自关注的目标已不可能聚焦,还会继续分散。欧洲提出的“战略自主”既是为了加强欧盟的凝聚力,也是基于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现实需要。如果没有“战略自主”,在应对诸如恐怖袭击、难民危机、地区动荡等问题上不仅动员不了足够的力量,而且长此以

① 张健:《大变局下欧洲战略取向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16页。

② Ed Kilgore, “Is there a Future Leader for Trumpism without Trump?” *Intelligencer Newsletter*, November 18, 2020,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11/who-could-lead-trumpism-without-trump.html>.

③ “Initiative for Europe—Speech by M.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https://initiative.blogs.ouest-france.fr/archive/2017.09.29/macron-sorbonne-verbatim-europe-18583.html>.

④ Ludovic Luppino, “L’assemblée parlementaire franco-allemande est née,” <https://puplicsenat.fr/article/politique/1-assemblee-parlementaire-franco-allemande-est-nee-139588>.

往,欧盟各国的向心力必然持续下滑,甚至导致一体化发生逆转。^① 欧洲的问题还是要靠欧洲人来解决,在这一方面美国既无力也无心承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有比较相似的诉求,涉及市场开放、竞争环境、知识产权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如果说美国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被赋予了过多的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内涵,那么欧盟对华政策则具有较大的弹性,而且不论在发展问题上还是国际事务中,中欧之间存在的共识不断增多。美国对华施压,包括“围剿”华为等,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诱压下或无奈跟进,或对华出尔反尔,体现出欧洲自主性比较脆弱的一面。现实是,中国的发展在总体上并不对欧洲构成威胁,反而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在中美之间做出简单取舍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对于中美关系,适度的超脱对欧洲的益处更多,要保持必要的主动,在一些时候不做选择反而胜过做出选择。换言之,欧盟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对外战略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中国;既与美国携手,又保持独立性;既对华防范,又对华合作,总之,要体现出欧洲在全球的独立地位和影响力,作为角逐的一方而不是作为角逐场而存在。”^②

概括起来,权力流散冲击着过于狭隘的同盟纽带,必然促进更普遍而广泛的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政治的三支重要力量,彼此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利益交汇,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共同需求,即使是中美之间也并非只有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单行线,欧盟也不可能简单地追随美国而放弃对华关系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正是在此意义上,世界变局给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

二 全球治理需求上升将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不断演进

分析中美欧三边关系不能夸大利益差异,也不应过于强调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尽管美国仍然会强化对华竞争,但两极格局和两极主导的国际秩序难以变为现实。中国要实现的是民族复兴,而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而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力量,总体上不能接受中美两国共治,也不乐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中美欧共同面对的是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严峻的现实是,世界变局不断深化发

^① 欧盟在2016年提出“战略自主”概念。当时欧洲处于恐怖主义和难民浪潮的冲击之下,加上英国公投脱欧严重削弱了欧盟防务安全的能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必须注入新的活力,法德等国家开始从提升防务能力入手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建设,发展至今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如2021年7月12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全球联通的欧洲”计划,寻求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要求在2022年春季之前,建立新的联合通信机制。这一计划具有战略自主的内涵,其背后意图无疑着眼于提升欧盟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② 张健:《大变局下欧洲战略取向及其影响》,第16页。

展,全球治理却存在惊人的赤字,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协调,积极构建包容开放和广泛参与的多边框架体系及秩序,否则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而全球治理如果没有中美欧的参与就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全球治理对包括中美欧在内的世界主要力量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也构成大国沟通的平台,中美欧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完成更多的磨合和互动,进而实现三边关系的不断进化。中美欧三边关系与传统大国博弈或地缘争夺的三角关系相比,最重要的差别是“开放性”为其外在条件。在此条件下,狭义地理解中美欧三边关系已经不合时宜。三边互动的结果会影响大国关系的未来,但如果不能适应全球治理的要求,单个国家也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①

全球政治已日益显现出多极化、多元化发展势头,权力趋于分散不可能逆转,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望也随之增加。虽然霸权主导与多方制衡的矛盾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但新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中,影响世界局势的力量和角色增多,途径和方法也在增多。在一个日趋多样化的世界里,任何大国包括原有的霸权国家都难以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主导他国的命运,更不可能阻挡和逆转历史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需要形成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局势的深刻变化,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多个权力中心、多样治理模式、多种理念思潮,也都会产生秩序意义。”^②未来较长时期内,中美欧等主要力量将在治理模式上产生各自的影响。“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虽然受到严峻挑战,但仍会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中国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欧盟更接近于第三条道路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模式,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都与美国有着明显的不同。”^③多种治理模式的相互作用,将为更具广泛意义的全球治理提供借鉴和帮助。

中美欧关系未来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既潜藏着美欧联手对抗中国的风险,又蕴含着竞争中赢得合作的机会。中国在与美欧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磨合中,能否达成基本的某种共识,而不是走进僵局,考验着各方尤其是中国的战略智慧。^④而欧洲如何选择,能否务实地走出第三条道路,得以在中美之间发挥有益的平衡作用,也

^① 即使在美国,大多数没有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外交政策专家都意识到,过去四年的时间内,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的单边主义做法都是错误的,并给美国的威望带来了严重伤害。

^②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页。

^③ 同上文,第13页。

^④ 即使形成局部共识,仅改变秩序的部分要素,也构成关系调整的重要进展。有关分析可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2, 2019, pp.6-20。

是一个关键因素。中美欧在经济层面的回旋空间则更为广泛。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受挫折,受疫情冲击后一些负面效应也开始集中显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国际合作滞后,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凸显。曾在全球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从顶峰跌落,来自“冷战胜利”的收益已经耗尽,金融资本扩张逻辑的负面效应聚集,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美欧国家内部社会撕裂严重、贫富鸿沟加深,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汹涌。原本在区域一体化建设中领先的欧盟,也遭遇困难,英国脱欧产生的冲击效应还未完全显现,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一体化都存在倒退的风险。但客观来看,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基本趋势未发生逆转,为此需要世界各主要力量凝聚更多共识,在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积极进展,强化必要的协调与合作才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动力。

为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美国从多领域、多层面启用了霸权工具,其中所谓的“技术联盟”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并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响应。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12月发布政策文件,明确主张与美国建立技术联盟,共同塑造跨大西洋技术空间。^①这也被视为在强调技术合作的名义下排斥战略对手的“技术生态圈战略设计”,^②虽然可能对中国战略形成某种遏制效应,但也受到全球技术布局、价值链结构、欧美技术治理水平差异等诸多因素制约,并可能阻碍自身技术进步。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客观途径,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再退回到相互分割、闭关锁国的状态,用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办法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以邻为壑的政策最后只能是害人害己,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国际社会形成更广泛协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换言之,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要靠更深入的全球化才能得到解决。而欧盟自身就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多边协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今天的欧盟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纯粹的国别安全,而必须将综合的欧洲安全置于全盘统筹之中,否则就根本没有安全可言。”^③

尽管近年来欧洲国家对华抱怨和不满增多,但中欧务实关系仍然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尤其在全球治理领域拥有比较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在2020年12月如期完成谈判,但在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有关冻结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动议,这一事态发展充分说明中欧利益关系的复杂联系,双方关系需要互动和磨合才能凸显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US: A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Dec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0_2279/IP_20_2279_EN.pdf.

^② 余南平、戢仕铭:《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51页。

^③ 肖元恺:《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出共同利益的有效牵引作用。力图将其所谓“规范化的人权、民主、法制和开放”等价值观更多纳入对外政策和战略竞争,是欧盟的突出特点,却不应将其绝对化而成为欧盟发挥国际影响和自身发展的羁绊。欧盟成员构成原本就具有多样性,战略自主只有在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下才能推进,否则内部矛盾都难以消解。《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更高水平的市场环境,对中国有吸引力,对欧盟终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利益增量。

尤其在世界变局中,由于乱象增多、难题加重,过于强调自己的利益和标准很可能产生强烈的反噬效应,坚持多样化中的协调才能把道路走宽。国际社会对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显著而迫切,只有凝聚广泛的国际共识,强化全球治理,才能找到解决全球性跨国性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中美欧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伊核协议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必须共同面对逐渐增多的全球性和跨国性风险和威胁。世界历史演变至今,依靠强权、扩张、掠夺和战争获取自身利益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特别是在主要力量都具备战略制衡能力、全球性挑战增多、地缘距离压缩等诸多现实条件限制下,依靠对抗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借助战争更可能带来沉重代价,导致共输的结果。此起彼伏的冲突和危机一再警示,当今世界不仅要反向消极地避免战争,更要正向积极地构筑和平,人类的未来才会更加光明。“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治理失灵、治理赤字严重,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在制度实施不力的领域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制度缺失的领域进行制度建设。”^①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正在面临强劲挑战,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如何在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达成有益平衡,应该是中美欧之间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已进入变革的重要阶段,未来走向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美国需要适应,欧盟需要适应,中国也需要适应,而在这一过程中,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趋于激烈。随着形势迅速变化,原本由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越来越难以提供广泛的公共安全供给和繁荣增长空间。过去由几个西方国家聚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七国集团作用下降就是明显的佐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广泛参与已不可避免。当然,今天的秩序转换不可能重复过去的模式,即通过战争或对抗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很可能要经历新旧秩序并存、旧秩序逐步消解

^①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第15页。

迭代、新秩序逐步形成的一个较长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力量结构将继续发生变化,旧有的霸权逻辑、强权政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有关新秩序的主张和实践仍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旧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行、多维理念共存,在一定时期仍可能是一种常态。由此,大国围绕权力及利益再分配的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其中针对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必将成为重中之重,中美欧都难以置身事外。然而,各国的地位在变化、角色在变化以及影响也在变化,不可或缺的是大国责任担当,新的秩序只有具备足够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安全和全球政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的方向发展。

中美欧三边关系乃至大国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重要改变,历史发展将证明非结盟即对抗的零和博弈越来越不合时宜,过于强调“本国优先”既贻害世界也必然伤及自身,竞争中存在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将在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更多地显现。只有超越单纯权力争夺和冲突对抗的传统思维和做法的束缚,中美欧和世界各国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大国关系已经远不是简单的“零和”,而是“非零和”,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发展,不能简单强调矛盾与冲突,还必须借助协调与合作,并以协调合作来制约化解矛盾冲突。竞争冲突与协调合作彼此错综交织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常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国家单打独斗在根本上已不可能行得通,迷信强权或武力也会适得其反,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也更有条件构建相生共处的大国关系。

当然,中美欧协调不可能轻松实现,中间会出现波折和反复,但在世界深刻的变局中,美欧各自战略选择的空间不是减少而是大大拓展了,即使是中美之间也并非只有一条通向冲突的单行道。中美欧都会尽可能捕捉变中之机,而不是和风险迎头相撞。“那些能够清醒做出选择并努力实现选择的人,与那些将命运完全交给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摆弄的人相比,最后的结局会使他们失望的可能性小一些。”^①可以认为,中美欧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三边互动进程和各自做出的努力,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种必然的宿命。中美欧关系交织着竞争与合作、妥协和冲突,即使在美国有时也加上欧盟对中国施压的海洋权益、贸易失衡、市场开放、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也并非只有对抗的一条路可走。中国在一些重点经济和科技领域虽然处于落后位置,但却具备了跟踪趋势、自主发展的巨大潜力,只要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并坚决以合作开放和改革进步为主要途径应对竞争压力,中美欧关系就不会彻底坍塌。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近期动向

^① Terence K. Hopkins et al.,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ZED Books, p.10.

看,其对中国的定位也日渐明朗,就是竞争、合作、对抗三位一体,其中对华遏制的成分仍占主导,但毕竟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美国想搞小集团政治没有多少前途,事实也将证明中国绝不是所谓的“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对手”,^①而是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重要参与者和进步力量。

三 中国战略选择构成中美欧三边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外部世界已经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中美欧三边关系在这一进程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也将构成全球政治发展走势的重要风向标。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积极探索和实践更高水平的开放,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不寻求建立狭隘的小圈子去应对外来压力,只要不自我孤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进步,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保持基本的战略稳定,中美欧三边关系乃至整个大国关系就不至于严重萎缩,美国动员盟友孤立中国的狭隘企图终究抵不过世界历史对大国协调的内在需求。

中国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至少在中短期里,中国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甚至可认为是中美欧三边关系实现良性互动的最关键变量。而随着利益冲突和协调的不断增加,中美欧三边关系将逐步走向成熟,甚至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三角关系。^②当然也必须看到,在大国关系层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仍将十分艰巨。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关系中努力追求建设性参与和合作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固有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性改变,战略忧虑将随着中国实力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中国界定为最大“战略对手”和“挑战者”的错误认知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利用同盟体系和地区热点问题施压和牵制中国的做法不会轻易收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挑起严重事端制造麻烦。对于中美竞争,总体上应立足长远,保持思想和战略上的冷静,在斗争、周旋与合作交织的复合应对中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充分借助欧盟等第三方因素和能够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极端发展的各种牵制因素,化解中美两国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矛盾,不断积累和拓展战略主动权。通过激活中美欧三边关系,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正面,增加对美关系的战略弹性。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2021, p.7.

^② 在国际关系中,要形成三角关系是有严格条件的,三角关系不等同于一般的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也不等同于三个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矛盾特殊体。参见唐水胜、徐弃郁:《寻求复杂的平衡——国际安全机制与主权国家的参与》,第131页。

面对美国将中国排挤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企图,不应随之起舞,不能被带乱节奏和步调,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深化与欧洲、亚洲等主要国际力量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合作,寻找共同点推进更紧密合作,搁置、淡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避免那些不必要、无意义的争论,不断累积战略互信与共识;适应国家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根据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需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和诉求,推动国内社会变革,以局部和短期利益换取全局和长远利益,为中美欧关系注入更多活力,增加对美博弈更大的回旋余地的同时,还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类似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当前及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虽将不断松动但仍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无论是物质实力、创新能力,还是制度性权力、国际影响力,西方虽相对下降但仍占据全球主要地位;美与欧洲等主要盟友关系虽出现裂缝但在维持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上仍有基本共识。新兴国家虽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对国际秩序仍存在不同理解且由于相互间也存在多样化的矛盾与分歧而难以形成合力。中国未来较长期的发展只能是主要依托现有国际体系来实现,不可能一下子超出现有条件而实现跨越。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讲,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积极的参与者、变革的推动者、多边主义的践行者。这也有助于中美欧关系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做好自己的事,是激活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基础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证明,沉着看待和应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回避、不夸大、不冒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从长远看,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必须立足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才更有条件处理好对外关系,同时也更有条件为中美欧关系注入更多活力。换言之,不能为美国的战略挑动所左右,最重要的还是坚定不移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坚定不移地做正确的事,持续推进国内优化和发展。尤其要处理好加强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认知与自主协调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达成动态有益平衡,不断强化战略韧性。应对世界变局、经略中美欧关系,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对手的战略压力本身,而是在外部的压力和刺激下进退失据,对外战略日趋激进,对内政策日趋保守,最终严重偏离和平发展的战略轨道。为此,中国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持续推进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将外部压力化作国家推进改革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在更高层次上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用自身的进步和开放推进对外关系的发展。例如在科技领域,尽管来自美国的围堵日渐趋紧,但中国巨型市场所能提供的回旋空间永远存在,何况“东方不亮西

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推进国际合作可确立“寓取于予,长远经略”的原则,更多地通过利益增量和优势互补的方式推动与有关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安全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培育国家间关系互信基础;建设性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在推进多边对话过程中深化多渠道合作关系。中国尤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不断强化利益融合,积极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正面接触和联系渠道,增强对外关系弹性,有效抵御和缓解美国战略挤压。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但也存在诸多反向制约因素,而且“不论美国力量有多大,但运用起来也有限度;不论中国有多大的雄心,但也需要经过岁月的砥砺”。^①中美之间不能不保持必要的交往,何况还有一些共同关切的牵引。中欧关系也需要在长期的互动中校准更明确的方向,不能指望一朝一夕解决问题,更不能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迫使对方屈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经过反复的评估和检验或许才能凸显其价值,世界上本没有捷径可走,中国要敢于走曲折的路到达胜利的终点。战略上的“间接路线”往往要比“直接路线”更为有效,^②这一点也被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的历史所不断证明。

中国的发展不是也不应是大国权力竞争的延续,更不是企图去替代原有的世界霸主,而是时代风云催化的民族复兴。这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作为重要支撑,也必将为世界政治和大国关系的进化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这一进程在当前尤其需要大战略思想及其实践的系统创新作为牵引和保障。

(作者简介: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载《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第108页。

^② 关于“间接战略”的思想可参见[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